

探寻傅衣凌先生开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之路

——记《傅衣凌著作集》出版恳谈会

陈支平

(厦门大学 历史系 361005)

傅衣凌教授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主要开创者,他毕生的学术贡献,主要就在于他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探索研究工作,力图通过深化地域性的细部考察和比较研究,从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中寻找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为了全面总结傅衣凌教授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开创性成就,陈支平教授受中华书局之托,花费3年余的时间,比较全面系统地搜集整理傅衣凌教授生前结集和未结集出版的所有论著,以《傅衣凌著作集》的形式予以重新出版。《傅衣凌著作集》共分6册:原《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依旧各自成册;原《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二书合为一册;原《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二书合为一册;其余各种散见于报刊杂志上的论文合为一册,根据傅衣凌先生生前的意愿,称之为《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

2008年9月3日,《傅衣凌著作集》出版恳谈会在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召开。厦门大学历史系杨国桢教授、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唐文基教授、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江太新研究员、原厦门大学党委副书记魏洪沼、清华大学历史系原主任李伯重教授、厦门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部主任陈支平教授、中山大学副校长陈春声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郭润涛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王日根教授等20余位傅衣凌先生的学生共同参加了此次恳谈会,同时与会的还有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叶显恩研究员、日本大阪大学滨岛敦俊荣誉教授等海内外知名学者。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林甘泉教授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君健教授也发来贺信。

中国经济史学,是中国历史学的基础之学。但是由于中国传统史学偏重于政治与经儒的领域,因此中国经济史学又可以称之为20世纪以来的新兴之学。20世纪中国经济史学的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偏重于社会史层面和经济史层面的两个主要学派。人们习惯地称前者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或新社会史学派;后者则为中国经济史学派,或新经济史学派。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史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似乎可以这样说,以1982年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创刊为标志,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在中国历史学界和经济史界占有了应有的位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两大中心。

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傅衣凌先生就开始了跨越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学术研究。傅先生早年在日本受过社会学的训练,在研究中特别注重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史,在复杂的历史网络中研究二者的互动关系;注重地域性的细部研究、特定农村经济社区的研究;把个案追索与对宏观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大势的把握有机地结合起来;强调注意发掘传统史学中所轻视的民间文献如契约文书、谱牒、志书、文集、账籍、碑刻等史料,倡导田野调查,以今证古,等等。他提出的中国传统社会“弹性论”、“早熟又不成熟论”、“公私体系论”,以及“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结构论”等一系列著名论点,在中国历史学界特别是中国经济史学界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承明先生认为傅先生在晚年所提出的“中国传统社会多元论”和“明清社会变迁论”,是自梁启超先生提出

“近世”概念以后,对中国近代史最精辟的看法。“傅衣凌晚年提出‘明清社会变迁论’,提出‘从16世纪开始,中国在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发生一系列变化’,但因种种原因,这些变化有中断以至倒退,但最后仍未脱离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我深佩其说。”经君健先生在写给恳谈会的贺信中说:“傅老的研究成果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和他的研究方法分不开的。他的独特见解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结合所熟悉的理论提出来的。他从搜集文献史料开始,并对个别地区社会经济进行调查,发掘了大量翔实的第一手私家资料。他所发掘的大量翔实史料为后来者提供了研究基础。他以大量经过鉴别的史实和认真的个案研究为依托,探求总的发展规律,通过微观和宏观相辅研究得出令人为之击节的结论。简言之,他的研究手段可以归结为两方面:一为‘三结合’,即官书正史与民间私档相结合,文献研究与社会调查相结合,局部性问题与全局问题相结合。二为‘双视角’,即通过社会的变动考察经济发展,从经济发展审视整个社会的变动;注意经济与社会、基础与上层建筑乃至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全面地历史地考察明清封建社会。强调经济史为社会经济史,成为傅老学术思想的突出特征。‘三结合’和‘双视角’提高了其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也大大丰富了中国封建经济史学研究的方法论。”

傅衣凌先生和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一代学者几乎是同时代的人。傅先生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所进行的注重基层社会的细部考察与宏观审视相结合以及跨学科的学术探索,与同时代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学人们所秉持的将传统的历史学与地理学、经济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种社会科学相结合,把治史领地扩展到广阔的人类活动领域特别是社会生活史层面,使得历史学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联系更加紧密的学术意趣,实有许多相通之处。然而由于20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的封闭状态,和外国学界缺少应有的交流,因此与年鉴学派在欧洲史学取得主导地位的发展相比,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显得沉寂,但是傅衣凌先生在如此艰难的学术环境里,开创出深具学术生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这一事实无疑是不应该被抹杀的,是应该让我们倍加自豪和珍惜的。如今,在国际学术界,“科际整合”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边界更加模糊,在互相渗透和融合中产生了许多新兴学科生长点。中国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们对于法国年鉴学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傅衣凌教授所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特别是区域社会经济史学,也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美、加和港台的一些人类学家,也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影响,注重民间文献的解读和阐释。可以预见,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而在国际的学术交流中显露出应有的互动与影响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著名的历史学家林甘泉曾经如此评述傅衣凌先生在开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上的贡献,“有的人批评说,解放以后把社会史的研究砍掉了,这种说法是不够准确的。什么是社会史?应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生活以及社会心理等等。这里面如社会生活(包括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解放后确实注意不够,但是在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方面,如阶级结构、宗法势力等就不能说都被砍掉了。傅衣凌先生在解放后一直很注意农村宗法势力和乡规民约的研究,而且作了不少成绩,他和他的学生可以说就是社会史的学派,怎么能说解放后没有社会史的研究呢?”因此,林甘泉先生认为傅衣凌先生的这种跨越多学科整合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探索、学术检验,以及学生们的继承发扬之后,形成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界有数的几个学派之一。他说:“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学术风格独特,有成果,有传人,其弟子是沿着先生的足迹走的。……傅衣凌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成果是学术界的共同财富,不管是

吴承明:《要从社会整体性发展来考察中国社会近代化——在“纪念傅衣凌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载《北京商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吴承明:《传统经济 市场经济 现代化》,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邹兆辰、江涓:《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访林甘泉研究员》,《史学月刊》2000年第1期。

不是他的亲传弟子,不管是否属于他的学派,都会从他留下的珍贵学术遗产中得到教益。”

《傅衣凌著作集》的整理出版和恳谈会的召开,相信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前辈学者探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艰难历程,学习和继承前辈学者的治学精神,无疑将产生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会的学者们纷纷从不同的角度缅怀了学习傅衣凌先生著作的经历与启迪,希望在今后的学习和研究工作中,脚踏实地,勤奋思考,不断探索,把傅衣凌先生开创的中国经济史学进一步发扬光大,为繁荣中国的历史科学作出应有的奉献。

(上接第156页)

“役”的成分,一条鞭重新征“役”,是否加重负担的问题,我们似乎可以这么来看:实行一条鞭之前的税法,实际上已不是当初实施两税法初期税则上规定的状况,原有的税制已经崩坏,将相隔数百年的税制作字面上的比较是没有意义的。不能以字面论事,应该是中国社会的一大传统。

四、黄宗羲所总结的加税规律只在有限的范围内适用

“黄宗羲定律”本意是用来解释长时段规律的,正如上文所述,从长时段看,自耕农和中小地主的税负应呈周期性变动的态势,而不可能单边上扬。只是在一段历史时期,或有限的范围内,定律才可能是适用的。从本文图2来看,大致是从F到D的阶段,或者从G到E的阶段,也可能有几十年或更久,杂税并入正税然后又生新的杂税,农民税负显著提升。其原因可能来自四个方面:其一是土地兼并加剧所引起的税源锐减;其二是战乱不止;其三是意在开展农村的改革,又没有相应的财政投入;其四是政府自发的膨胀和贪腐。其中第三和第四两个方面可能会延伸到近代。此外,近代还有对外赔款。

黄宗羲本人身处明末清初,正是战乱重重、赋税叠加的时期。战争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加税是必然的选择。黄宗羲的总结反映了他对当时现实生活的感受。我们固然应该重视黄宗羲的总结,也十分赞赏秦晖教授将其上升到“定律”的高度,并引起人们的重视及对现实的关注。但问题在于:在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负担不可能无止境地增加下去,当税负高到可能侵蚀他的生存基础时,形势就会发生大变:抛荒、投献、甚至揭竿而起。巨大的社会冲击会使统治者开始关注社会公平,收敛官僚大地主的特权,整肃官吏的贪腐,精简政府的开支,使农民负担有相当的减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由于缴税的人多了,而使每个人缴的税有所减轻。因为在大量荫庇、浮寄的情况下,许多人是不缴税的,抱怨税重的是一部分人。在当时的社会机制下,统治者的清醒往往要付出社会动荡的代价。从中国历史来看,农民负担只是一个表象,它反映了深刻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博弈机理。如果中国农民能够有足够的承受力承受杂税变正税的不断加码的负担的话,改朝换代也许就不会有了。

刘秀生《深切缅怀傅衣凌先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